



梅贻琦

本刊记者 关娟

在清华百年校史上，有这样一位杰出的校长：他学贯中西，却又时常沉默不语；他倡导学术氛围自由、教授治校，使得清华迅速走出学校历史上第二轮校长更迭风波；他在抗战时期带领清华在危难中建业，主持西南联大领导工作，培养出一大批璀璨的学术大师；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在海峡彼岸再创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清华……他就是被称为“寡言君子”的梅贻琦校长。

梅贻琦这个名字始终与清华联系在一起，不仅因为他与清华渊源颇深：他是1909年清华第一批直接留美生，回国后1915年即来清华任教，曾任清

华学校教授、教务长、驻美留学监督等，1931年至1948年他连任校长，成为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任职最久的一位。更因为他是奠定“清华校风”成效最卓著的人之一。清华著名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自梁启超演说中的引用之辞，而能够将其充分发挥者则是梅贻琦。

梅贻琦说过的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为学界所推崇。从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开始，他延揽名师、广聚人才，完善学科建设，推行通才教育，提倡学术自由，“造就清华校史上名家辈出的黄金时代”，

使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即便在风雨如晦的抗战时期，他作为常委实际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坚持秉公处理、一视同仁，以兼容大气的风格维系了风雨飘摇中的西南联大，成为坚实的掌舵人，使西南联大培育出栋梁无数，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传奇一页。他一生身体力行，形成办学的特殊风格，使他成为近代华人世界极重要的教育家。

“清华所培养出来的多少人才之中，对母校竭其心力，能如是锲而不舍的，已有几人？目前从事于大学教育的人中，或负行政的责任，或主专

门的讲席，对所出身的学校，能如其全神贯注契合无间的，能有几人？不因时势的迁移，不受名利的诱引，而能雍容揖让与大学环境之中，数十年如一日，中国之大，又有几人？”这是1940年潘光旦在《梅月涵夫子任教廿五年序》中的感慨，也是对梅贻琦一生坚持的一种概括。

梅贻琦先生之风 ——学比渊澄，道同岳峙

1962年，梅贻琦先生在台湾去世时，哀思如潮，无数的名家学者对他的逝世感怀嗟叹，从蒋梦麟、吴大猷、叶公超到顾毓琇等，人们纷纷寄托对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这样一位“真君子”，这样一位伟大教育家的哀思。蒋梦麟执笔的祭文中有“先生学比渊澄，道同岳峙，仁者爱人，作育多士。先生粹然儒者，躬行身教，对国家之贡献独多且要”的话语。无论从学识、人品，还是为人、处事，梅贻琦都做到了为人师表，马约翰教授曾经这样评价梅贻琦：“他有他的人格……真君子 Real Gentleman 的精神。梅先生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

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

在傅任敢先生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梅校长》中提到，梅贻琦先生高洁的品格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专

“他这一生，由少而壮，由壮而老，整个韶光，都是为了清华。”“在这几十年中，清华不是没有经过艰苦与风波的，但是在他的镇定与领导之下，一切艰苦与风波都度过了。”“这专字有三层深度。第一层是说专干一种职业，决不今天办教育，明天弄政治，后天搞实业。第二层是说专干一件事业，决不今天做甲校的教务，明天做乙校的主任，后天做丙校的校长。第三层是说专心致志，决不东应酬，西交际，干着校长望着部长。做到第一层的已经不多，做到第二层的绝少，做到第三层的便绝无而仅有了。梅校长的专，便是属于绝无仅有一层的。”

大

“这时（注：西南联大时期）他的心中与他的作为都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他对整个联大一样看待，所以

整个联大也都一样看待他，因此就能一直联到底了。这事做起来不易，假装不成。这事的成功是他真真实实具有一副大的品格。”

公

“在大学法里，大学是没有评议会这一组织的；有之，始自清华。评议会可说是一个集体的校长，校长只是评议会中的一员。这是真正的民主制度，真正的校务公开。”“在清华，一切没有私，一切都是公开。因此，学术的风气才能增进，出色的教授才肯前去。”

爱

“做领袖的人有两种：一种使人信服，一种使人悦服。毫无疑问地，教育工作者应当使人悦服。”“因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梅校长的品性中深深具有这一点。他爱学校，所以把他一生都献给了学校。他爱国家，所以在抗日时把他的儿女打发到远征军去。他爱同事，所以待人一视同仁，从无疾言厉色。他尤其爱青年，所以在每次的学潮中他都以自己的力量掩护着青年的安全。”

廉

梅贻琦一生勤廉，他追求的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1928年他被派去美国接任留美监督，解决了那里的财务混乱问题，到1931年他初任校长便放弃许多传统特权，再到西南联大艰苦岁月里的节衣缩食，经常用废纸头起草公函、报告提纲等。他认为：“虽是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



1932年国立清华大学校务会议成员 左起：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梅贻琦、杨公兆、张子高



梅贻琦与家人合影

俭

作为梅校长的家人，梅夫人韩咏华女士和他们的几个子女，却丝毫未感受过校长家属的礼遇。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不让自己在联大读书的4个子女领取补助金，他们家“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点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梅贻琦唯一的儿子梅祖彦的眼镜打破了，却没有钱再配一副。为了补贴家用，夫人韩咏华与教授夫人一道绣围巾、做帽子上街去卖。1955年，梅贻琦到台，却把夫人留在美国。他在台挣的台币，根本无法照顾夫人生活，夫人不得不自谋生计，在衣帽厂做工，到首饰店站柜台，去医院做护理照料盲童，从62岁一直干到66岁。

梅贻琦先生如此高洁的品质，得到了众多名士的敬仰，林公侠在《忆新月涵师》中感叹道：“月涵师生平对于名利很淡薄，专心致力教育事业……他长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病倒住医院也欠帐，后来各同学热心献金才清了欠款。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为万世师表。”

梅贻琦之言

“办学校，尤其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知道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 inspiration。”

“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

“吾从众。”

“贻琦生长于斯，清华实犹吾庐。就是有一些成绩，也是各系主任领导有方。教授中爱看京戏的大概不少，你看戏里的王帽，他穿着龙袍，煞有介事地坐着，好像很威严，很有气派，其实，他是摆给人看的，真正唱戏的可不是他。”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

“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之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的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

“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子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中年梅贻琦

梅贻琦之行

1909年，梅贻琦在清华庚款首批“直接留美生”考试中，在630名考生中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

1914年夏，梅贻琦从美国吴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College）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并被选入Sigma Xi（美国一种专为奖励优秀大学生的制度，又称“金钥奖”）荣誉会员。

1926年4月，清华教授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教务长和评议员，在校十余年、深孚众望、尤其是得到少壮派支持的梅贻琦脱颖而出，以33票当选（到会教授47人）。

1928年11月，梅贻琦被任命为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他奉命到美之后，马上着手对监督处进行全面改革，简化了办事机构，精简了办事人员，日常生活上一切从俭。在他的努力之下，监督处的工作大有起色，经济混乱现象很快得到彻底改观。

1931年12月，梅贻琦就任清华校长，住进了校长住宅——清华园甲所。搬家之后，他首先作出的决定，就是宣布放弃校长在生活方面的所有特权。校务管理方面，他尽力减少办事机构，裁减办事人员。

梅贻琦在原有土木工程系的基础上添设机械、电机两系，组成清华工学院，自兼院长。后由顾毓琇任院长。从1934年起，清华与资源委员会合作开设航空讲座，进行航空实验，建立亚洲最大的航空实验风洞等，这是清华航空系的前身。这一时期，为清华以后的工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5年11月，梅贻琦离开美国到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为了选择一个合适的校址，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台湾全岛。他多次远涉重洋，到西方各国原子能机构访问考察，引进技术，延揽人才，订购设备。从1958年5月原子炉基地破土动工，到1961年4月，仅三年时间，便完成了包括核子科学馆、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原子炉炉房及实验馆等在内的所有建筑项目和有关装置的建造安装工作并调试完毕，达到了临界。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北。在病危期间，有一个加锁的手提包一直放在他的病榻下，谁也不知道装有何物。他去世后，秘书立刻加封，后组织专门人员启封查验，原来全是学校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毫厘不爽。

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去世时，社会各界哀思如海，悼文如潮。

蒋梦麟执笔《治丧会祭文》（部分）

……呜呼——天之将丧斯文欤？胡夺我先生之速！……先生学比渊澄，道同岳峙，仁者爱人，作育多士。先生粹然儒者，躬行身教，对国家之贡献独多且要。与并世诸君子比，华若未逮，而实则过之。卒也，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而国人之尊仰先生，翕然称之，盖无智愚，通朝野，乃至白叟黄童，胥无异词。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于先生见之。

先生生平尽瘁国立清华大学，虽于国家危难之际，两度出长教部，而兼领清华如故。人有恒言：见果知树。五十年来清华人才之盛，堪称独步，贡献之多，尤彰明而昭著，斯非幸致，实耕耘者心血之所倾注。

先生之行谊，本乎中国文化之渊源，而学术则造乎西洋文化之峰巅。观乎先生之型仪多士，我先民之中体西用之理想在焉。

今世以有无原子科学设备，为衡量一国文野之准绳。先生忠爱国家，……殚精竭虑，奋不顾身，为国家提供此一需要，使……中国崛起而与于近代文明国家之林，厥功之伟，莫之与京。

顾毓琇悼梅贻琦诗一首

没有死亡：

青青草原的云雀重复地唱。

清华园荷花池畔的钟声赞赏响应！
整整三十年的春风化雨，桃李成行；
长城的烽火消散，昆明湖依然宁静。
没有死亡：原子炉的临界可以保证。
静听呀，宇宙的神秘像呼吸般轻盈，
在核心破裂中放射出无穷的巨能。

伟大的梅先生，

高风长在，
英灵永生！

“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迅速崛起的清华



1941年4月清华校庆时校领导成员合影。

右起：叶企孙、冯友兰、吴有训、梅贻琦、陈岱孙、潘光旦、施嘉炆

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成立，首任校长罗家伦追求“中华民族在学术上独立发展”，强调“研究是大学的灵魂。”学校要“以学术标准为衡”广罗人才。他推动将清华纳入国立大学系统，添招女生，整顿清华基金，积极进行基础建设。为20世纪30年代清华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

1931年梅贻琦就任校长后，作风民主、理念先进，他积极延聘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执教，不断完善清华院系设置，重视科研、教学与社会服务，在清华发展历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一流的师资队伍建设、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校务管理制度、学科的完善与发展、开创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先河等。在1937年抗战前，清华的发展达到历史高峰。

1941年，清华在昆明庆祝建校30周年期间，西方许多大学及学术团体发来贺电，美国大学来函中更有“中邦

三十载，西土一千年”的赞誉。梅贻琦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由他草拟、潘光旦执笔的《大学一解》（发表于1941年4月《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一文中，他的教育理念“本乎中国文化之渊源，而学术则造乎西洋文化之峰颠”。大师论、通才教育、人格教育、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都是其中的核心内容。

教授治校 名师荟萃

“教授治校”最初发端于美国耶鲁大学，它始于耶鲁第八任校长德怀特（Reverend Timothy Dwight, 1795～1817年任职）。他在任时聘任了3位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优秀教授：西利曼、杰里迈亚·戴和语言教授金斯利，让他们负责各自学科的发展和建设。这种高校管理模式核心是教授在大学的决策与管理中起决定性或主导性作用，学校的行政机构起服务与辅助作用。北京大学的

蔡元培校长曾在20世纪初践行了这种制度。

清华大学当时的组织结构是，由校长“综理校务”，教务长、秘书长分管学校教务、行政事务，教师通过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以及各专门委员会参与学校管理。教授会由教授、副教授组成，评议会是这个体制的核心，是校内最高的决策、立法和审议机构，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互选的若干评议员组成。各学院院长都由教授会从教授中推荐。评议会实际上是教授会的常设机构，教授治校的作用通过评议会的职能体现出来。由校长主持，教务长、各学院院长参加的校务会议是行政的审议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议决一切通常的校务行政事宜，协调各学院、学系之间的问题等。

陈岱孙曾评价该制度：“在校内，它有以民主的名义对抗校长独断专权的一面；在校外，它有以学术自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势力对教育学术机构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依靠这种制度，梅贻琦广揽人才，聘请了一大批名师，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清华，名师荟萃、星光熠熠，师资阵容盛极一时，仅列当时部分教授名单如下：

学院	系	教授
文学院	中国文学系	朱自清（主任） 陈寅恪 杨树达 俞平伯 刘文典 闻一多 王力
	外国语文系	王文显（主任） 毕 莲 陈福田 吴可读 吴 宓 温 德 翟孟生 钱稻孙 叶公超 华兰德 陈 铨 吴达元
	哲学系	冯友兰（主任） 金岳霖 邓以蛰 张荫麟 沈有鼎
	历史学系	蒋廷黻（主任） 刘崇鋈（代理主任） 陈寅恪 孔 繁 噶邦福 雷海宗 张荫麟
	社会学系	陈 达（主任） 吴景超 潘光旦 李景汉
理学院	物理学系	吴有训（主任） 叶企孙 萨本栋 周培源 赵忠尧 任之恭 霍秉权
	化学系	张子高（主任） 高崇熙 萨本铁 黄子卿 张大煜
	算学系	熊庆来（主任） 郑之蕃 杨武之 赵访熊 曾远荣
	地学系	冯景兰（主任） 翁文灏（名誉教授） 袁复礼 张印堂 洪 绂 张席禔
	生物学系	陈 桢（主任） 吴韞珍 李继侗 彭光钦 赵以炳
	心理学系	孙国华（主任） 周先庚（代理主任） 臧玉鑫
法学院	政治学系	浦薛凤（主任） 王化成 张奚若 萧公权 赵凤喈 沈乃正 陈之迈
	经济学系	陈岱孙（主任） 蔡可选 萧 蓬 余肇池 赵人隽
工学院	土木工程学系	施嘉炆（主任） 李 协（名誉教授） 王裕光 蔡方荫 陶葆楛 张泽熙 张润田 李谟炽 吴柳生
	机械工程学系	庄前鼎（主任） 李辑祥（代理主任） 刘仙洲 殷祖澜 殷文友 汪一彪 华敦德 冯桂连
	电机工程学系	倪 俊（主任） 顾毓琇 章名涛 任之恭 李郁荣 赵友民

此外，外籍学者朗之万、维纳、狄拉克、哈达玛、华敦德、原田淑人等也被请来讲学。这一时期的清华师资队伍，在国内是无与伦比的。另外，通过发展民主管理体制，梅贻琦在清华营造了一种自由的学术氛围，使教授们充分发挥所能，而梅贻琦自己则是常常以“吾从众”的态度甘居幕后。正是梅贻琦的这种治校方式，使这些名师们发挥所长，为清华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出卓越贡献，同时也不断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清华。

通才教育 人才济济

通才教育（又称自由教育、通识教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近代西方大学普遍推行的教育方针和思想体系。它主张大学生不仅拥有专门的知识，更需接受普通教育，通才教育实际上是人文主义关于个性自由发展和个人全面发展这一理想的体现。“只有当教育本身就是目的，独立于其实用性结果，并只导向自由思维而无其他特定目标时，它才能被称为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培育了智慧，扩展了寻求根源和深刻理解的能力。其目的不是传授某种特定内容，而是开发特定的思维能力：独立与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和能从偏见、迷信与教条中自我解放出来的能力。”

梅贻琦结合中国思想文化，对通才教育理念做了进一步深化，“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需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此时，梅贻琦所提倡的通才教育并非西方“Liberal Education”的简单搬移，这种理念集中体现在由他担纲、潘光旦执笔发表的《大学一解》中：“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立群各的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梅贻琦所倡导的通才教育就是要在大学阶段给予学生全面的知识，使学生学习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达到“新民”的任务，包括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学生皆能融会贯通，这样的培养方式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

依据这样的教育理念和名师培育，这一时代的清华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仅列举部分如下：

蒋南翔，青年运动领导者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家，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

曹 禺，戏剧大师、戏剧教育家，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进清华研究院。

钱钟书，学者、作家，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赵九章，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学系，留校任教。

王铁崖，国际法学家，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1936年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

张明觉，生物学家，试管婴儿之父，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心理系。

季羨林，语言学家和梵文学者，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吴 晗，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

陈省身，数学家，1934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

费孝通，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

彭桓武，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学系。

钱伟长，理学家、教育家，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继续读研。

钱三强，原子核物理学家，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学系。

何泽慧，物理学家，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学系。

王大珩，应用光学家，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学系。

林家翘，力学与应用物理学家，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梁守槃，火箭技术专家，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

乔冠华，外交家，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

葛庭燧，金属物理学家，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荣高棠，原国家体委副主任、体育理论家，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蒋南翔



青年曹禺



青年钱钟书



青年赵九章



青年王铁崖



张明觉



青年季羨林



吴晗



陈省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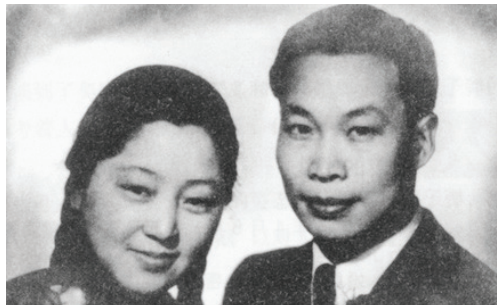
费孝通



青年彭彰武



钱伟长



青年钱三强与何泽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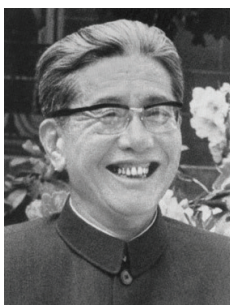
王大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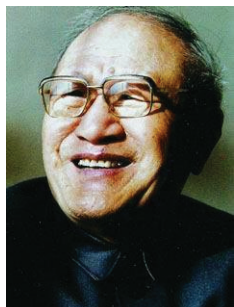
林家翹



梁守燊



乔冠华




葛庭燧



荣高棠

《大学一解》（节选）

今日大学教育之学程太多，上课太忙，为众所公认之一事，学生于不上课之时间，又例须有多量之“预备”功夫，而所预备者又不出所习学程之范围，于一般之修养邈不相涉。习文史哲学者，与修养功夫尚有几分关系，其习它种理实科目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犹木工水作之习一艺耳。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何以故？曰，无闲暇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斯得之。今学程之所能加惠者，充其量，不过此种种自修功夫之资料之补助而已，门径之指点而已，至若资料之咀嚼融化，门径之实践以致于升堂入室，博者约之，万殊者一之，则非有充分之自修时间不为功。

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此又近顷大学教育最所忽略之一端。《大学》一书尝极论毋自欺，必慎独之理。不欺人易，不自欺难，与人相处而慎易，独居而慎难。近代之教育，一则曰社会化，再则曰集体化，学养无非操演，而慎独与不自欺之教亡矣。夫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乃仅就智识之切磋而为言者也；至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励，则固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于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励，示鉴戒而已。自“慎独”之教亡，而学子乃无发有“独”之机会，亦无复作“独”之企求；无复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应有之充分之距离，适当之分寸，浸假而无复和情绪制裁与意志磨练之为何物，即无复和《大学》所称诚意之为何物，充其极，乃至学于学问见识一端，亦但知从众而不知从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张，力排众议。晚近学术界中，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由来有渐，实无足怪。大学一书，于开章时阐明大学之目的后，即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梅贻琦草拟，潘光旦执笔）